

读暨大考军校未果返印尼 赤胆红心爱国一生

—— 一邦加爱国教师黄禄厚的传奇经历(中)

1945年8月17日，苏加诺总统在雅加达宣布印尼独立，华校恢复，父亲才离开深山回到他为之奋斗的华文教育事业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得到这个消息，父亲立刻联合邦加岛8港华侨团体，并亲自起草电文，通电北京，支持、拥护新中国成立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
电文长达两个页半，从此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华会馆高高飘扬。当地华人，华侨无不欢欣鼓舞，手舞足蹈并相互传知。尤其是我们居住的泥屎卜(Kampung Bintang)，华侨、华人更是敲锣打鼓到深夜。

众所周知，邦加栢港百年前，荷兰殖民者从祖国沿海一带如广东、福建等地运送多少青壮年到栢港锡矿场当劳工(猪仔)。泥屎卜是废弃的矿产发展起来的一个村子，村里居住着华

侨、华人几乎都是矿工血统的后代。他们都心怀祖国，都希望祖国繁荣昌盛。

1954年10月20日，邦加华侨团体总机构筹备委员会成立，宗旨之一“在五星红旗下团结华侨，解决困难事件及共同有益事业。”还重申“促进和巩固中印人民的友好”。当时选出筹委会五人：黄书典(商人，热爱华侨教育事业)、黄禄厚、杨宏祥、李纸刚、廖德创。

父亲当时考虑自己能力有限及本职工作较多，没有接受筹委会的决定和挽留。黄书典也因商务较忙，谢绝挽留，补选谢贤德和龙运材参事。尽管这样，两黄还是积极支持筹委会的工作。

由于华侨总会全体同志不辞辛苦，努力工作，工作出色，当地华侨、华人都心向祖国，纷纷把子女都送至华侨学校

学习，一时间国民党开办的学校(国民学校)学生纷纷转学，我班就有2位他们的父亲是解放前逃亡到印尼的高官。

不知什么时候在栢港的一个亲国民党组织——广肇会馆也停顿乃至消失了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祖国面貌日新月异，邦加华侨更热爱新中国。很自然的，“五星红旗”“义勇军进行曲”等歌声响彻所有华校。

记得由杨宏祥老师手绘的高2米左右的巨幅敬爱的毛主席画像，悬挂在中华会馆中央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让全国人民敬爱的慈祥的伟大领袖。

1945年印尼独立直到1960年，应该说是中印关系最好的时期。每逢印尼国庆、祖国国庆，各进步团体、机关、学校甚至街道都会升起红白旗及五星红旗，那场面甚为壮观。

这段时间，特别1955年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以后，中国名望大升，许多进步团体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，如进行进步教育的义务夜校，工人、农民、市民都乐于接受教育，这段时间栢中许多学生中学毕业后回国继续升造，为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
1960年印尼排华，为了做好遣返工作，父亲被推选为遣侨委员会主席，为了广大华侨的切身利益与安全，父亲除了要完成自己栢小校长等本职工作外，不分昼夜地完成祖国交给他的光荣使命。

为了安排好华侨的归国事宜，他经常深入基层、街道、工厂探望，努力资助有困难的家庭，病倒了，还咬牙坚持工作。

1962年排华浪潮渐缓，党和政府提出了“多留少走，不走更好”的政策。这时

很多等待多时，尤其已办好手续，且已变卖了家产、辞去了工作的爱国华侨，思想不通，怨气甚大，这对父亲的思想工作增加了多大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，父亲首先放弃了全家回国的念头，和邦加侨团总会的同仁一道，选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干将组成了许多小组，深入到基层、机关、学校、民间，宣传祖国的正确政策，通过多少日日夜夜的细心教育工作，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，事态才逐渐平息。

父亲平易近人，也乐于助人，还严以律己，在当地享有声誉。他对自己能为祖国、为社会主义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而自豪。

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及祖国各地，他的学生也非常敬重他，经常给他通信。

他早年资助过的两位学生，更是不忘恩情，从他们离校直到父亲病重，还有书信往来，也和我有联系。

一个是潘玉良老师，父亲每次抄录的诗词寄给我时，还复写两份，一份寄给我妹妹，一份寄给潘老师，潘老师异常珍惜。

改革开放后他曾试图整理出版，但由于当时手续繁杂，也就被搁置下来了。



上世纪50年代的回国潮，邦加栢港中华小学师生欢送教师回国深造合影留念。



栢港中华小学校长黄禄厚颁发的小学毕业证书。(鸣谢雅加达资深读者李锡富提供)